

我国气候司法能动之发展动因及优化方向

张 丹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目前,我国尚未确立真正狭义的气候变化诉讼,气候司法的专门化建设也处于探索阶段,在传统诉讼架构中,以能动司法回应气候变化应对诉求,为气候司法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行思路。新时代能动司法的时代性、政治性和综合性特征赋予了气候司法能动“服务性社会保障”的特殊意涵。在此基础上,面对气候司法在当事人适格、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存在制度真空和实践难题,气候司法内部何以能动、何处能动、如何能动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保障气候司法的公正合理可以由外向内逐步渗透,在能动司法与立法、行政的张力解读基础上,向内深究。从能动对象出发,就气候司法所涉要件的认定标准进行适度灵活的解释;从能动方法出发,利用法律发现和法律解释等司法裁判方法,将气候变化政策进行法律化处理;继而,细化能动程序,在“识别气候变化影响类型-落位气候司法能动对象-助力气候司法裁判”的程序性结构中,实现气候司法能动之优化。

[关键词] 气候变化;能动司法;气候司法;适度能动

[中图分类号] D 912.6; D 91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5) 02-0048-11

一、引言

气候司法开端于1986年美国洛杉矶市诉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案,历经30余年,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力手段,其以气候变化诉讼为主要载体,超越传统诉讼定分止争之内涵,泛指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下不同诉讼类型的集合,以及法官在司法各环节处理气候问题、修正气候立法、执行气候政策的现象^{[1]195}。当前,气候司法存在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2种主要范式,各个国家普遍采取公益诉讼与私法诉讼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要求行政机关就影响气候变化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管,另一方面通过直接对私主体提起侵权诉讼来应对气候变化。在国外,气候司法普遍滥觞于“司法能动主义”,以美国为例,其在国际气候合作中摇摆不定的行为态度以及联邦层面气候治理的消极被动,使得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公民只得诉诸司法来督促政府采取气候规制措施。依托其相对发达

的司法诉讼体制以及公众对诉讼的高认可度,气候司法逐渐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造法型”能动态势。与之相异,我国对气候变化问题高度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文件均对司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应当发挥的作用提出了要求,气候司法立基于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以回应社会需求为目标,呈现出明显的“回应型”能动的特征^{[2]35}。

不可否认,我国气候司法同国外气候司法均呈现能动特质,气候责任落实不到位、气候立法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为其首要驱动力,然不同之处在于,我国能动司法并非纯粹功能导向下司法

[收稿日期] 2024-07-0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推进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体系构建研究”(22JJD820001)

[作者简介] 张丹(1995—),女,山东烟台人,博士生,主要从事环境法学、法学理论研究。

能动主义的“舶来品”，其具备本土自觉性^{[3]148}。首先，我国法院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地位的提升以及司法现代化进程的需要，令其发展重心逐渐向与外部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偏移^[4]，法院开始主动融入社会治理格局，体现出协作性和服务性特征。其次，能动司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呈现出中国特色。再次，人们对良好气候条件的依赖以及气候治理所涉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使得能动司法成为法院因应气候治理时代需求的必然结果。概言之，时代性、政治性、综合性共同构成了我国能动司法的突出特征^[5]。

现今，学界已经关注到能动司法的气候治理态势，有学者借助对能动司法同立法、行政的张力解读，剖析我国环境司法能动的必要性及隐忧，建议采取温和的环境司法能动^{[3]147}；有学者基于实然与应然研究，提出以适度能动为气候变化能动司法的尺度^[6]；有学者梳理出我国气候司法“被动司法→弱能动司法→强能动司法”的发展趋势，通过对比国内外气候能动司法实践，厘清中国语境下“适度能动”回应型气候司法之实现路径^{[2]31}；还有学者则指出气候司法社会功能扩张之隐忧，强调“整体主义”解释观下气候司法法理功能的回归^{[1]194}。由此可见，能动司法已然成为气候司法的当然选择，“适度能动”“温和能动”等理念也对能动司法的“适度”标准提出了要求。但是，面对气候变化的高度复杂性，具体到个案审理时，究竟什么算作“适度”，相较什么“适度”，气候司法能动中“适度”的质与量的标准如何显现等一系列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明晰。循此，本研究尝试从国内气候司法现状入手，总结我国气候司法能动的现实条件，并在省思气候司法能动发展的基础上提炼能动空间，从司法能动主义演变历程出发，解析能动司法，从而自“能动对象”和“能动方法”2个方向提出对我国气候司法能动优化的新思考。

二、何以能动：我国气候司法能动之发展动因

我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保持积极立场，

自“政策推导”到“立法研究”，再到“能动司法”，“多层次”“综合治理”等政策要求推动着气候司法的功能拓展。审视我国气候司法现状可以发现，由于气候变化诉讼的内涵及外延尚不清晰，气候变化的司法应对普遍依附于传统诉讼架构，依托能动司法实现救济，这为气候司法能动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新时代能动司法为“适度能动”理念赋予的时代意蕴，恰好与气候司法的目标要求相契合。两者共同构成了我国气候司法能动的发展动因。

（一）我国气候司法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

随着《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意见》中“积极探索气候变化司法应对举措”^[7]要求的提出，《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意见》中“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8]要旨的申明以及《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中“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9]新案由的确立，司法在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愈发突出。与国外狭义的气候变化诉讼界定不同，我国实践层面目前采用较为广义的内涵，将排放温室气体、臭氧层损耗物质等直接或间接影响气候变化的案件统一划归“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受还原主义影响，面对复杂的气候问题，通过分解细化，将气候变化问题落位至不同环境介质之中，回归传统诉讼类型，通过单项环境法律予以救济，似乎已经成为思维定势。在该思路的引导下，气候治理难免存在“一叶障目”之弊端，面对气候整体性问题时形格势禁。对此，许多学者从气候利益的公共特质出发，以气候利益的整体性保护为目标，探讨狭义气候变化诉讼之内涵及路径选择，但是，相关研究仍处在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在此过渡时期，为满足气候治理系统性、全局性、开放性的基本要求，各诉讼领域均表现出对能动司法的现实需要。例如，在刑事诉讼领域，要想实现以刑事惩戒促进气候治理的目标，就需要法官合理利用能动司法，将气候变化风险纳入刑事审判进程中，从环境介质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和其他物质及能量污染犯罪，非法经营、堆放、排放、处置危险废物等引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行为入手，在犯罪情节、证据考量、事实认定等方面兼顾气候变化风险，将认购碳汇与生态修复手段相结合^[10]。在民事诉讼领

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绿色原则”为气候因素纳入民事合同提供了可能,并且,侵权责任编对环境权利的保障救济,碳排放权交易诉讼、碳汇交易诉讼、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等的渐次推进均体现出服务“双碳”目标的政策导向,为法官能动司法提供了空间。而且,德清县人民检察院诉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德清某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自然之友诉国家电网甘肃分公司弃风弃光案(以下简称“甘肃弃风弃光案”)等典型案例的出现,使得狭义内涵的气候变化诉讼初见端倪,为能动司法提供了发展导向。在行政诉讼领域,行政机关气候变化政策落实的实际效果直接决定能动司法的范围和限度,兼之检察机关、环保公益组织参与度的提升,促使我国气候司法需要兼顾损害救济、政策落实以及风险预防等多重职能,“回应型”能动的气候司法格局成为时代之选、实践所需。

我国气候领域的“回应型”能动司法与国外“造法型”能动司法相对应,虽同样具有政策实施功能,但不同的法治背景和社会现状使得能动司法在方式、目的、运行机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国际层面,气候领域司法能动主义态度强烈,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持消极态度,国际气候变化政策的落实并不理想,气候治理停滞不前。气候变化受害者为保障自身利益,只得选择以诉讼方式同政府对话,以保障气候变化相关基本权利为基础,利用司法审判活动自下而上地督促政府进行气候规制。而我国基于司法机关在政治序列中的定位,将服务和保障人类美好生活需求,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注重以能动司法补位解释气候立法,辅助监督气候执法,贯彻落实国家政策^{[2][31]}。具体来说,我国气候司法对于能动司法的现实需要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如何将气候变化政策融入裁判说理之中。目前,实践中正在探索以扩大解释、类推适用等方式寓政策于说理解释,将大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运用至气候事实认定,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等伦理价值和社会追求融入裁判说理^[11],以扩大气候规制领域,补足气候法律缺位。例如,在合同纠纷类

案件中,法官正在尝试将气候变化政策融入合同解释和效力认定之中,使之成为纠纷解决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12]。(2)如何依托现有诉讼类型不断扩大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的范畴。目前,大气污染公益诉讼已然成为广义气候变化诉讼的典型代表,在传统诉讼机制框架内,如何将气候变化应对的现实需求结合不同案件类型得以实现,离不开能动司法的灵活适用。(3)如何通过气候司法助推气候变化政策转化为法律制度。对此,司法领域正在探索通过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对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规范进行司法演绎^[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司法服务的意见》就温室气体排放侵权纠纷、适应气候变化行政补偿、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纠纷、绿色金融纠纷等案件均提出了科学、严密的审理意见^[14]。可见,不论司法政策还是实践探索均开启了对传统司法功能的创新改造,以回应国家政策目标及气候治理需求。在气候司法中,能动司法已不仅限于定分止争的传统功能,正在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处理气候变化问题,通过综合运用不同领域的法律规范作为裁判依据,以更具先导性的政策要求作为事实认定、法律解释的材料,自个案起始,助推实现气候变化减缓、适应的结果。

(二)“适度能动”理念与气候司法目标要求的深度契合

在我国环境法领域,能动司法较其他部门法领域的“繁荣”有过之而无不及,基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紧迫性,能动司法理念需要进一步贯彻于气候变化应对进程,推动气候司法发挥实践先验性,肩负起立法补充与政策落实的双重责任。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需要警觉政策落实目标下“后果主义”的盲从,另一方面又必须为实现“双碳”目标寻求切实可行的方法论。“适度能动”理念与这一目标相契合,成为解决问题的核心。

如前所述,我国气候司法与国外气候司法呈现出不同的能动表现。但是,在具体运行中,其均为能动司法设定了基本限度。在国外,加州诉通用汽车案、康涅狄格州诉火力发电厂案等案件以“政治问题原则”回避了司法越权之可

能^[15]，马萨诸塞州诉联邦环保署案在基本法律的基础上通过灵活解释为气候司法提供了一定的运行空间，“权限”和“法度”始终是国外司法能动的标尺。在我国，气候变化应对的开放性、灵活性需求与司法谦抑性原则间的张力，使得法官在气候司法实践中普遍持谨慎态度，“适度能动”成为气候司法现代化建设的入口。以甘肃弃风弃光案为例，受传统案件受理标准影响，一审法院尽管意识到“弃风弃光”行为的气候影响，但是在进行当事人适格认定时仍谨守教义学方法，认为甘肃电力只是电力购销和调配供应的电网企业，无法像发电企业一样直接实施生态破坏行为，所以原告的起诉不符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的条件。而到了二审阶段，甘肃省高院则采取更为开放积极的态度，认为“本案有明确的被告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应当受理”^[16]，并且肯定了自然之友通过公益诉讼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意义。由此可见，气候变化类案件自提到到审判都对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提出了新的课题。非直接排放主体是否可以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是否要承担环境损害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1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能否适用于非直接排放主体？气候变化损失应当如何计算及认定？等等，在目前法学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难题甚至空白^[17]，只能诉诸能动司法予以先验式回应。此时，“适度”的范畴予以具象化，其要求气候司法以传统环境司法作为参照系，寓气候政策、传统文化理念、气候综合因素等“软要素”于司法裁判之中，以气候治理实效为“质”之目标，以司法权限及法律规范空间为“量”之标准。由此，我国气候司法能动呈现出“服务性社会保障”的特殊意涵，其内生于能动司法时代性、政治性以及综合性本质，外显于“适度能动”之限度标准。

具体来说，能动司法在气候领域的运用源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应对气候变化问

题的客观需要以及诉讼参与人的实际需求。事实上，气候司法同时包含着克制与能动元素，“适度能动”的时代性意涵为我国气候司法能动之优化提供了前瞻性指引。首先，气候作为生态环境的子要素，依附于生态环境的整体可持续性，在成熟的气候司法治理体系形成之前，其当然划归传统诉讼架构予以应急保障，而传统环境司法所涉法律规范及惯例自然构成“适度能动”之基本标准。其次，囿于气候系统自身的强波动性、高敏感性以及不可替代性，气候司法相较于传统环境司法紧迫性、不确定性以及弹性要求更高，气候司法治理需要必要的能动空间以最大限度满足气候治理的客观需要。而这种客观需要以国家的气候政策、总体部署与安排为根本依据，引导气候司法能动与中央总体部署保持一致。最后，气候司法的溢出效应催化着开放型司法的形成，综合认识气候变化多层次演变过程、多领域矛盾冲突以及多元化社会效应需要法院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合作。此时，气候治理实效成为“适度能动”之结果导向，自末端设定适度范畴，自个案出发发现气候治理问题，提出气候治理之策，保障能动司法的有效性。由此可见，“回应型”气候司法态势下，“适度能动”的司法理念既为气候司法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应急之策，也为我国气候司法能动的进一步优化奠定了逻辑基础，其与气候司法目标要求的深度契合构成了我国气候司法能动的发展动因。

三、何处能动：我国气候司法之“能动对象”

如前所述，新时代能动司法的特殊意蕴为气候司法能动提供了发展空间与逻辑基础，为进一步优化气候司法能动，应当在其“服务性社会保障”的时代意涵上，通过细化能动空间、明确能动要素等方式具化“适度能动”标准，保障气候司法的公正合理。

（一）原告资格之明晰

就原告资格来说，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可知，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于气候变化诉讼的原告资格都作了比较宽泛的规定。特别是美国，其赋予公民依据“公民诉讼条款”“环境

公害制度”或者“公共信托制度”就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提起诉讼的权利^{[18]158}。在我国环境诉讼中,原告主体主要分为4类,即私益主体、检察机关、社会组织和省、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借鉴马萨诸塞州诉联邦环保署案的经验,我国在气候司法能动中对于原告资格的认定可以适度放宽标准。

1. 由于气候利益具备鲜明的公共性特质,作为环境利益的下位概念,其构成气候司法利益网格的核心,应当优先保障。在传统环境诉讼架构中,检察机关和符合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当然具备以环境公益保障为由就气候变化问题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但是,从狭义的气候变化诉讼视角来看,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没有检察机关以气候变化作为直接诉讼请求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例存在;就检察机关是否具备直接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资格,法律层面也缺乏明确规定。德清某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被视为“中国检察机关提起的首例气候变化诉讼”^①,为检察机关提起狭义气候变化诉讼提供了经验铺垫,说明我国特有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经过实践检验后具备提起狭义气候变化诉讼的现实条件。同样,就社会组织提起气候变化诉讼来说,在现有的2起“弃风弃光案”基础上,环保公益组织以气候变化为直接诉由提起诉讼也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伴随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实践经验的日渐成熟,可以在环境公益保障的基础上认可检察机关和符合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提起狭义气候变化诉讼的主体资格。

2. 对于私益主体就气候关联利益(即私人利益)提出的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诉的利益是确认其是否具备原告资格的前提,在传统环境诉讼中,损害结果往往呈现为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等私人利益受到侵害,其诉讼要件相对明晰,资格审查难度小。但是,在气候司法中,目前法律体系内缺乏就气候变化问题的专门性立法,私益主体可否以气候变化为由提起私益诉讼,实践中尚无先例,加之气

候变化影响范围广泛,涉及主体范围难以确定,如何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进行认定存在难题。对此,可以从“损害可追溯性”与“损害可救济性”2个方面入手,就“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进行扩张解释。一方面,对“损害可追溯性”的认定标准降低至“贡献”标准,即损害的产生并不要求由被告单一主体造成或由其造成决定性影响,只要其行为对于损害后果的产生存在“贡献”,达到“合理可追溯性”即可;另一方面,将“损害的可救济性”的内涵扩展至只要对不可控情形给予及时回应将有助于未来气候条件的改善即可^{[18]159-163}。

3. 就省、市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来说,其基于公共信托理论、国家环境保护义务,依托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易就气候变化问题形成系统性应对方案,在气候变化损害救济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同样具备提起狭义气候变化诉讼的可能性,亦可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助力气候治理。

概言之,对于原告资格的明晰,可以从气候利益与气候关联利益的特征出发进行原告资格的类型化诠释,通过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运用,赋予原告资格标准以弹性空间。

(二) 被告适格之认定

气候治理要想“治本”,关键在于控制温室气体产生的源头,即诉讼被告一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此处,“明确”指的是被告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足够明确,能够与其他主体相区分^{[19]137},即满足形式当事人标准。而若从实质当事人层面理解被告适格的标准则与之相异,其通常指被告系案件所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相对方^[20]。司法实践中对被告适格的判断大致有以下2种情形:(1)被告适格为案件胜诉要件,被告为实际承担义务的人。(2)原告的权利主张指向合同相对人或侵权行为人以外,根据实体

① 该案引起了克莱恩斯联邦环保协会的关注,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中国第一起涉及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更标志着一个更为重要的里程碑——中国检察机关提起首例气候变化诉讼。参见:闫晶晶,单鸽,王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高质量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检察公益诉讼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掠影[EB/OL].(2023-08-15)[2024-09-05].https://www.spp.gov.cn/spp/zdgg/202308/t20230815_624857.shtml.

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义务的主体^[19]¹⁴⁶。比照气候司法领域，在尚未进入实体审理的程序开始阶段，只要原告的主张对象确定，其均具备形式当事人条件，而进入实际审理环节后，被告适格问题则涉及实质当事人审查^①。目前，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中主要存在3类被告，分别为温室气体直接排放者、温室气体非直接排放者（关联主体）、与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行政机关，囿于专门的气候变化立法欠缺，被告适格问题成为气候司法能动的重要内容。

1. 对于温室气体直接排放者，其是温室气体浓度升高的直接责任人，无需赘述。但是，我国法律并未专门规定气候变化致损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2条第3款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并列提出，说明气候变化无法划归环境污染范畴，但就生态损害的范畴大于环境污染而言，将气候变化划归生态损害，结合《民法典》第1229条实现救济具备理论可行性。在气候司法中，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者多为碳排放巨头，其具备预见碳排放行为致损的能力，可以通过新材料、新技术的研发等方式将外部损害内部化，作为被告当然合理。而规模较小的排放者许多并不具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能力且其排放行为不可避免，影响程度有限，诉讼无法激励其减少排放^[21]，故虽为加害人，但成为被告的必要性不强。

2. 对于温室气体非直接排放者（关联主体）能否成为被告存在争议。在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中，温室气体排放者的因果关系认定相对简明，而温室气体的非直接排放者是否可以成为诉讼被告，现有环境法律制度中并未提及，若严格进行限缩解释，其被认定为被告适格略显勉强，除非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和1166条的规定通过无过错侵权责任予以追究。不可否认，气候变化问题无法归因于单一排放者，发电公司等碳排放、碳交易关联主体对于温室气体排放具备连带关系，末端治理影响着气候治理效果，需

要通过能动司法来扩大被告范畴，进而超越还原主义方法以应对气候变化中交织的复杂难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1条提出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为气候变化问题前端治理提供了机遇，但是否可以将温室气体非直接排放者的行为解释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仍有待商榷。与原告资格的扩张解释相契合，被告适格的标准扩张，是两者相辅相成的必然结果。由此，可以在原有被告适格认定标准的基础上进行空间拓展，例如，以“被告是否实际控制涉案标的物”“被告与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关联度”“被告对于气候变化应对的贡献值”等判定被告是否适格，这实际是将被告适格与案件胜诉要件相关联，在既有标准基础上反向吸纳，从后果出发，融入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最大效益值。

3. 对于与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行政机关是否满足被告适格条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考察。我国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呈现高度复杂性，经济发展与气候保护的协调平衡是行政机关执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难题。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无法适应气候变化应对需求，亟需能源革命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但这一过程举步维艰，不免拖缓经济发展进程。另一方面，许多碳排放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小觑，其产业性质决定了其仍需要相当大的碳排放空间以保证充分发展^[22]。受其影响，行政机关在进行气候监管时极易因利益关联范畴广泛而引发诉讼。在国外，气候变化诉讼一般是针对行政指令、规则有效性提起，也有一部分针对相关义务的履行情况。我国目前主要针对气候变化相关具体行政行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3条赋予了当事人在提起诉讼的同时就相应规范性文件一并提请审查的权利，但受制于司法权自身的局限性，实践中法官往往采用司法策略规避审查，以致审查率普遍较低。而在

① 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概念经历了由实质当事人概念向形式当事人概念的转变。由于形式当事人依原告的主张而确定，不取决于客观的实体法律关系，所以在尚未判断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诉讼早期以及实体权利义务人与实施诉讼的人相分离时，形式当事人可以对引起诉讼、进行诉讼的主体法律地位进行说明。而实质当事人则是指实体法律关系主体，其与案件胜诉相关联。参见：[1] 张卫平. 民事诉讼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125. [2] 奥特马·尧厄尼希. 民事诉讼法[M]. 周翠，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1.

具体行政行为方面,公民是否可因气候变化损害为由就违法行政行为或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以及如何运行,仍存在制度障碍,只能依赖政策引导以及能动技巧实现。由此可见,气候变化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关系复杂、微妙,并且其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也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严格的利害关系证明无疑会阻塞气候变化的司法治理通道,理应应以能动司法适当降低气候变化相关行政诉讼的门槛。对此,不妨从以下2方面着手拓展被告适格内容:(1)将《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2项作适当扩张解释,结合公共信托理论,将同气候变化相关的利益诉求纳入政府责任范畴。(2)面对公民个人因气候变化提起的行政诉讼,只要其能够证明其个人利益因行政行为而遭受了气候变化方面的特定损害,则可以认定与其相关的行政机关为适格被告。借此,由私益损害救济督促行政机关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

(三) 因果关系之判断

气候变化是气候的基本属性,所谓气候变化,通常是指“气候相对平均状况的偏离”^[23],其不仅仅是一个因果过程,还是因果链的结果。与传统诉讼相比,气候变化诉讼的因果链中存在“人为排放→温室气体浓度升高→气候变化→特定损害”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均存在能动司法的空间。(1)人为排放与温室气体浓度升高是因果关系链条的第一步。2023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最新公告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燃烧化石燃料、不平等和不可持续的能源及土地利用导致了全球变暖,当前的水平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1℃”^[24]。温室气体浓度的升高并非一蹴而就,其来源于气候破坏者排放气体的综合效应。对于任何单一的排放者来说,有害活动并不限于其本身的排放行为,而是对总效应的贡献,此为首要环节的能动因素。(2)温室气体浓度升高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为因果关系链条的第二步。在生态容纳能力范围内温室气体的浓度区间、各气候现象的应然范畴等问题可以通过科学技术予以明确,但在事实认定环节中,温室气体浓度升高量级同某一气候变化现象偏离全球基准水平间的联系成为能动裁量又

一要素,被告行为是否合理、是否采取预防措施等均需要法官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3)气候变化与特定损害后果之间的联系为因果关系链条的最后一步。全球变暖必然会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存在显性与隐性之分,表现为损害与风险2种后果。损害结果往往易于量化,因果关系较为单一,而风险则需要以计算机建模等概率计算的方式进行判断。

依循传统因果关系认定逻辑,责任归因往往存在2种方式。

1. 如果没有行为,损害就不会发生,那么行为就是损害的事实原因。此时因果关系单一,能动范围最小,对应直接造成显性损害的情形。该情况多适用于私益救济中气候变化问题的附带救济。

2. 集体责任,即某一特定损害由气候破坏者行为的综合效应造成。具体分为3种情况:(1)当存在多个被告的独立行为造成特定损害时,尽管其中只有1个人造成具体损害,但不确定哪一个人,此时每个被告都负有连带责任,没造成结果的被告需要自己承担证明责任。但是,该情况针对的是特定损害救济,而前一环节中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产生,因果关系的认定需回归气候变化因果链中,特定损害结果与气候变化影响的责任认定与分配如何裁量存在空间。(2)多个行为根据损害结果承担按份责任,此时具体损害后果与气候变化影响具备高度的关联性,能动空间较小,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鉴定。(3)多个独立行为结合在一起产生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损害后果。此时,能动司法面临的困境同情况(1)相似,因果关系并非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调查判断,而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是诸多内部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实质因素是因果关系确认的核心,很难通过举证责任的规则直接解决,需要诉诸科学技术辅助。根据实质因素测试,如果事实调查者确定任何被告的行为是造成伤害的实质因素,那么这些行为就是事实原因,事实调查者有责任确定所有原因总和中的哪一部分足以构成实质性因素^[25],继而由法官能动衡量责任归因。

四、如何能动：我国气候司法之“能动方法”

面对纷繁复杂的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法官在审理裁判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在规范维度上，法官在面对无法达到司法期望的法律规范时，需要针对具体案件进行法律的能动解释，这一过程中不免存在规则适用偏移之隐忧。例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1条中“重大风险”认定标准不明使得法官在面对气候变化公益诉求时普遍采取谨慎态度，抑或将其转化至侵权类案件，以可预见的损害作为责任追究标准。然而，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消极性，并不利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充分应对。另一方面，在技术维度上，传统以损害救济为主的环境诉讼架构已经较为成熟，能动空间小且难度较小，而气候司法囿于裁判依据不完备、诉讼架构不明晰等困境，使得其能动司法空间较大且难度提升。故此，应当围绕能动司法之隐忧，自微观向度起始，细化能动方法，以实现气候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之统一。

（一）气候变化政策的法律化处理

作为一种司法理念和方法，我国能动司法要求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回应社会发展需要，具体包括服务型司法、主动型司法和高效型司法3个层面，其实质是一种“法内能动”，即在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框架内法官履行审判职能上的能动^[26]。面对日益提升的气候战略规划需求，碳排放权交易、能源生产等领域已经对气候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能动性解释、适用法律规范将气候变化政策目标融入个案审理中。法律发现和法律解释作为主要的司法裁判方法，可以在气候司法能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妨由此入手，将气候变化政策进行法律化处理，从而达到能动司法的规范与合理。

法律发现作为一种具体的司法方法，指的是法官从法律渊源中寻找案件裁判依据的活动，其分为“法律之内发现法律”和“法律之外发现法律”。如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

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等为气候治理提供了顶层设计，但是尚不足以支撑“双碳”目标的实现。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官需要在法治理念指引下尽可能扩大法律发现范畴，最大程度吸收气候变化相关法律，以找寻可以用来融合气候变化政策以及裁判具体案件的法律规范。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规范关注到了节能和减排的内在关联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等法律规范注重煤炭及相关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密切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规范通过鼓励、支持、引导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来应对气候变化。此外，农业、水资源、自然保护区、湿地、天然林、海岸带等领域相关法律规定也从侧面助推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因此，法官在进行法律发现时需要首先从正式法源中发现法律，并且在进行法律发现时关注不同领域立法隐含的气候应对方略，尽可能发掘法律背后的能动依凭。此外，气候变化问题呈现“多因一果”“多果一因”“风险隐蔽”等特征，这促使法官同时关注从非正式法源中发现法律，在现有法律基础上严格按照维护司法公正的目标来进行“法的续造”。可见，最大范畴的法律发现为个案审理划定了能动空间。

在法律发现基础上，法律解释可以从技术层面将气候政策以及后果导向因素融入法律目的内，进一步实现气候变化政策的法律化处理。详言之，法律解释虽然是一种法律适用方法，但同时也是一种权力，是司法主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法律文本以及其他法源法律意义进行说明的权力。法律解释的内容涉及司法的各个方面，并且贯穿于整个司法过程，具体来说可以归结为4个方面，即发现、阐明、论证和判断^{[27]134}。对应气候司法领域，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虽不完善，但是不等于不确定，法律解释可以根据已有的规范材料结合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对法律文本作出最佳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气候司法实践问题的灵活判断与处理。就具体的法律解释方法

来讲,目前存在数十种方法^{[27]226},其中常用的方法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未来在气候司法能动中可以进一步探索类推解释、历史解释、扩张解释、社会学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而在面对方法论立场、本体论立场、中庸立场等多种法律解释基本立场时^{[27]137},我国气候司法能动应当更多采用本体论立场,通过规范与个案的相互调适将后果取向纳入解释范畴,以判决的合理性为目标,尊重结果的多样性。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司法裁判中法律解释要解决的是法律一般性与案件特殊性之间的差异,其对象始终是具备强制约束力的有效法律文本,本体论立场下法律解释的后果取向更多是法条主义的一种内嵌机制,其依赖于目的解释对法条主义进行合理化调适^[28],以弥合气候立法的局限性与气候变化应对目标间的距离。由此,我们应当意识到,目的解释与其他解释方法是相辅相成、相互递进的关系,法律解释也始终与个案相关联,法律解释的立场抉择、方法选择等均应遵循立法目的与法律规范之对应关系,合理协调立法目的与社会需求间的关系,并且通过法律解释内部的程序性约束与外部监督相结合来保障法律解释的规范性。

(二) 气候司法能动程序性环节的细化

气候变化的特质决定了其存在损害和风险2种可能后果,由于救济途径的差异,气候变化影响类型的划分成为气候司法能动的首要环节。在“损害”后果下,可以回归传统诉讼架构,明确界分气候利益与气候关联利益,依托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机制改革,以气候利益为核心,将其关联案件进行专门化划归,通过利益识别、利益分类以及递进权衡等利益衡量方法进行能动裁判。在“风险”后果下,更宜通过气候变化风险的评估来限缩“重大风险”的认定范畴,利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来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其中,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可以细化为4个步骤:步骤一,调查气候变化风险涉及的自然对象,并且结合区域环境容忍限度确定可能受气候变化风险影响的范围量;步骤二,识别气候变化影响单元内的决定性影响因子,即对区域环境造成突出风险的气候因素;步骤三,比照特定环境要素的指标要求,就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阈值进行预估;步骤

四,确定气候变化风险向损害转变的临界点,从概率统计的视角出发,评估不同环境区域中的气候变化风险。其后,结合具体案例,落位气候司法能动对象,开启气候司法裁判环节,进而形成“识别气候变化影响类型-落位气候司法能动对象-助力气候司法裁判”的程序性结构。

详言之,气候变化后果的产生存在“人为排放→温室气体浓度升高→气候变化→特定损害或风险”等多个环节,实践中,宏观层面,人为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的过程已得到科学证实,然而特定人为行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值”以及其与特定损害间的关系却难以明确。如今,我国气候变化尚缺乏专门性司法治理手段,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可以详细划分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公益诉讼案件,其普遍沿用事后救济逻辑,将气候变化纳入生态要素中作为判断责任的组成部分,而只有环境公益诉讼中就预防性问题予以明确提及。循此,可以结合现有格局,将能动司法具化至既有诉讼模式来定制能动方法。在刑法领域,受司法谦抑性原则的影响,能动司法空间相对较小,加之我国气候犯罪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能动司法应当秉持“严而不厉”的指导思想,将行为的累积效应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依据,将法益救济与犯罪预防融合于责任实现之中。在民事领域,气候变化应对诉求明显增多,预防性与救济性措施兼备使得其应对方式更为多元,能动空间宽泛。一方面,在环境侵权私益纠纷案件中,基于诉权理论,气候因素依附于私人利益而存在。基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温室气体直接排放者有义务将其行为性质、预期后果予以公开,能动司法可以由此入手,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统计数据,结合科学手段就行为损害及气候风险进行双重认定。与此同时,由于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者最了解其排放气体的成分、特性、影响等特征,被告的举证证明也变相规制了案涉气候问题能动救济的限度。另一方面,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1条规定的公益诉讼受理条件与“三审合一”的组织机制改革相结合,将预防性司法与救济性司法、环境公益诉讼与环境私益诉讼相互融合,为气候问题的专门化治理提供能动空间。易言之,公益救济抑或私益救济只是气候变

化应对的形式之一，专门性救济与附带性救济也只是气候变化的应对方法，其最终目的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司法治理。因此，在环境司法专门化机制下，同一案件，在进行能动司法时可以提炼气候相关所有公私益问题，将其置于同一平台，结合特定损害后果反向溯源证据信息来进行责任认定。在行政领域，原告就气候变化问题证明其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压力较大，与民事救济相似，气候相关的环境权利目前缺乏专门性立法支撑，原告只能回归传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领域进行气候变化的附带应对。此时，因果关系证明的重心在实际损害，气候问题作为风险因素归于能动空间。而对于原告提出的一并审查行政行为所依据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法院可以结合《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通过运用裁判补充型的司法建议来进行处理^[29]，在回应气候变化应对需求的同时尊重行政职权，避免越俎代庖。

五、结 语

当前，囿于气候法制与气候治理需求间的不对称，司法在气候治理中的能动纠偏作用愈发凸显。伴随回应型司法态势逐渐显现，气候司法能动日渐勃兴。气候司法能动作为气候治理的重要手段，既往研究侧重于能动司法与立法、行政间的张力弥合，鲜有关注能动司法内部何以能动、何处能动、如何能动等问题。面对气候治理对能动司法的现实需求，正确理解与适用能动司法成为气候司法建设的关键。当前我国气候司法能动内生于能动司法时代性、政治性以及综合性本质，外显于“适度能动”之限度标准，呈现出“服务性社会保障”的特殊意涵。其以气候治理实效为“质”之目标，以司法权限及法律规范空间为“量”之标准，为我国气候司法能动的优化奠定了逻辑基础。循此，在具体运行层面，可以从当事人适格、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进行能动司法的内部优化。与此同时，充分利用法律发现、法律解释等司法裁判方法进行气候变化政策的法律化处理，进而通过程序性环节的剖析实现“适度能动”的具象化。未来，在气候变化的司法应对中，能动司法仍呈不可避免之势，应当继

续向内深究，结合气候司法专门化建设趋势，充实“适度能动”之时代意蕴，实现气候正义。

[参考文献]

- [1] 孙雪妍. 气候司法法理功能的再思考 [J]. 清华法学, 2022, 16 (6): 194 - 206.
- [2] 赵悦.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适度能动”之气候司法研究：域外实践与实现路径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3 (2): 31 - 42.
- [3] 秦天宝. 司法能动主义下环境司法之发展方向 [J]. 清华法学, 2022, 16 (5): 147 - 162.
- [4] 顾培东. 新时代能动司法的倡导与回应型司法的构建 [J]. 中国法学, 2024 (2): 26 - 45.
- [5] 公丕祥. 论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主要特征 [J]. 中国应用法学, 2024 (1): 20 - 27.
- [6] 周珂. 适度能动司法 推进双碳达标：基于实然与应然研究 [J]. 政法论丛, 2021 (4): 13 - 22.
- [7]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EB/OL]. (2016 - 05 - 26) [2024 - 09 - 05]. <http://wej.court.gov.cn/news/view-42.html>.
- [8]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EB/OL]. (2021 - 10 - 08) [2024 - 09 - 06].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10e3866a556eaddaf3e5c837104399.html>.
- [9] 最高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 (试行) [EB/OL]. (2021 - 01 - 04) [2024 - 09 - 05]. <http://fzzfyjy.cupl.edu.cn/info/1080/12688.htm>.
- [10] 韦璐. 江苏首例！非法捕捞破坏海洋生态，除判刑外还需认购“海洋碳汇” [EB/OL]. (2023 - 06 - 28) [2024 - 09 - 0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U1ODAxOQ==&mid=2651028885&idx=1&sn=0036520a2a872624e93a1c18b0e3caf7.
- [11] 王灿发, 王雨彤. 我国气候变化司法治理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J]. 环境保护, 2023, 51 (6): 7 - 10.
- [12] 朱明哲. 司法如何参与气候治理：比较法视角下的观察 [J]. 政治与法律, 2022 (7): 18 - 33.
- [13] 刘丹. “双碳”目标下我国气候变化诉讼的司法进路 [J]. 环境保护, 2023, 51 (6): 28 - 31.
- [14] 李高.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司法保障 稳妥有序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 [EB/OL]. (2023 - 02 - 23) [2024 - 09 - 05].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3/02/id/7157009.shtml>.
- [15] 高利红, 苏达.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转向：以

美国气候诉讼为视角 [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2 (5): 36-50.

[16] 自然之友. 甘肃弃风案, 我们“重头再来” [EB/OL]. (2019-01-25) [2024-09-05]. <http://www.fon.org.cn/action/domain/content/161>.

[17] 戴仁辉. 我国气候变化诉讼第一案终获调解 [EB/OL]. (2023-07-26) [2024-09-05]. http://www.clapv.org/wrx/vip_doc/26777569.html#:~:text=%E8%AF%A5%E6%A1%88%E4%BA%8E2016%E5%B9%B4,%E5%91%8A%E5%90%8E%E5%87%BA%E5%85%B7%E8%B0%83%E8%A7%A3%E4%B9%A6%E3%80%82.

[18] 王燕. “利害关系”的嬗变: 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趋势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5 (1): 157-165.

[19] 袁琳. 民事诉讼中被告适格的审查与裁判 [J]. 法学, 2021 (8): 137-150.

[20] 王亚新, 陈杭平, 刘君博. 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153.

[21] 谢鸿飞. 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成立及其障碍 [J]. 政治与法律, 2022 (7): 2-17.

[22] 李艳芳, 田时雨. 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背景下气候变化风险规制立法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 58 (2): 42-50.

[23] 李兴峰.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立法研究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17.

[24] Global Climate Litigation Report: 2023 Status Review [EB/OL]. (2023-07-27) [2024-06-25]. <http://www.unep.org/resources/report/global-climate-litigation-report-2023-status-review>.

[25] MICHAEL DUFFY. Climate change causation: Harmonizing Tort Law and scientific probability [J]. Temple Journal of Science, Technology & Environmental Law, 2009, 28 (2): 185-241.

[26] 袁祥, 王逸吟. 什么是能动司法? 为什么要能动司法? [N]. 光明日报, 2010-05-13 (9).

[27] 陈金钊. 司法文明集览·司法方法卷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3.

[28] 戴津伟. 司法裁判后果取向解释的方法论应用 [J]. 法学, 2020 (7): 175-192.

[29] 谭冰霖. 我国气候变化行政诉讼制度之构建: 通过司法的气候治理 [J]. 东岳论丛, 2017, 38 (4): 161-170.

Th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Optimization Direction of Climate Judicial Activism in China

ZHANG Dan

(Center for Jurisprudence Research/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Judicial Civiliz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China has not established a real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in a narrow sense, and the specialized construction of climate justice is also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Under the traditional litigation framework, active judiciary is used to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appeals, providing a feasible idea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limate justice. Nowadays the epoch-making, political and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active judiciary in the new era give climate judicial activism a special meaning of “service-oriented social security”. On this basis, in the face of the institutional vacuum and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aspects of the suitability of the partie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causality, climate justice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under the drive of policy, such as why, where and how to be active. Therefore, ensuring the fairness and reasonability of climate justice can gradually penetrate from outer to the inner part. Based on interpre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active judiciary, legis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we can deeply investigate the inside, start from the active objects, and carry out a moderate and flexible interpretation on the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of the elements involved in climate justice. Beginning with the active approaches, we can legalize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by using judicial methods such as legal discovery and legal interpretation. Then, the active procedure is refined to optimize the climate judicial activism through the procedural structure of “identifying climate change impact types—locating climate judicial activism objects—assisting climate judicial adjudication”.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active judiciary; climate justice; moderately active

(责任编辑 冯庆福)